



江苏省高教学会组编系列教材
高职高专人文素质教育教材

文学鉴赏

WENXUE JIANSHANG



莫砺锋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江苏省高教学会组编系列教材】

【高职高专人文素质教育教材】



国标书名号(CB)设计

自选设计

设计

文学鉴赏

主编 莫砺锋

副主编 孙立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鉴赏/莫砺锋主编.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 8
(江苏省高教学会组编系列教材. 高职高专人文素质教育教材)
ISBN 978-7-81137-328-8

I. 文… II. 莫… III. 文学欣赏—世界—高等学校:技术学校—教材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0690 号

文学鉴赏

莫砺锋 主编

责任编辑 史创新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215021)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西门外 邮编:212300)

开本 787 mm×1 092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439 千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7-328-8 定价:28.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35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高职高专人文素质教育教材

编 审 委 员 会

主任 葛锁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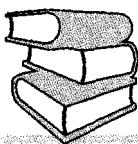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明 王承宽 王毅 王薇

孙征龙 成海钟 吴春笃 闵敏

钱进 徐金城 莫砾锋 黄建晔

葛锁网



前　　言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越来越成为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各种类别的高等院校都开设了一系列的人文素质教育选修课程,与之相应的系列教材也应运而生。于是,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绘画、雕塑等课程受到了各专业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文学鉴赏》就是针对高职高专院校学制短、技术性强的特点而编写的人文素质教育教材。与目前流行的各类《大学语文》及文学作品选不同,本书并不以单纯的作品赏析或文学史介绍为目的,而是贯彻了“简而精、小而全”的原则,以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为解读对象,以鉴赏评析为主要内容,以文学史线索为解读背景,力图让学生加深对经典作品的理解,并且举一反三,获得独立进行延伸阅读的能力,使学生在接受中外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过程中提高人文素养。

本书的各个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全书则是一个系统的整体。

本书共分七章,前五章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第六章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七章属于外国文学。每一章都包含“概述”和“作品选读”两部分内容。本书每一章开篇的“概述”即文学史简介,对这一时代的文学史及其文化史背景进行提纲挈领的描述。这样,尽管本书只能入选少量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与作品,但学生可以通过文学史简介领略该时代的总体文学风貌,学有余力的学生还可以进而掌握延伸阅读的作家作品。“作品选读”部分由作品、注释、解题及赏析、习题等部分组成。本书所选的作品都是值得反复阅读的公认的经典作品,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尽量避开中学语文课本中已经出现过的作品,力求经典性与新颖性的统一。本书的作品赏析包括对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的详细解析,也包括对作者生平及其创作情况的介绍,希望让学生学会如何欣赏文学作品,并进一步了解该作家的其他作品及其整体特征。本书的习题包含对所选作品进行深一步的延伸思考及讨论,并另外选取一些与文选内容相关或风格类似的作品,使学生在大致相当的语境下自行解读同类作品,以培养他们的欣赏眼光,提高他们的解读水平。

教师在利用本书进行教学时,可以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对本书的内容进行适当的取舍。如果课时较少,则可以先选讲作品选读部分;如果课时比较充裕,则可以进一步讲解文学史简介部分。至于习题,则可以视课时和学生水平的具体情形而自行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布置给学生,不必强求其全。总之,本书的内容具有较大的可伸缩性,各类高职高专院校的教师可以因地制宜地灵活运用。

本书编写人员的分工如下:第一章至第五章的“概述”,孙立尧;第一章的“作品选读”,李国才;第二章的“作品选读”,林丽丽;第三章的“作品选读”,吴芳;第四章的“作品选读”,陈永红;第五章的“作品选读”,胡佩霞;第六章,徐国方;第七章,卢锦明。全书由莫砺锋和孙立尧统稿,莫砺锋审定。

编　者

2009年6月

编写说明

2005年6月,江苏省教育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苏教高〔2005〕16号)进一步要求各高等学校对学生“全面加强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培养。把人文素质教育纳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之中,增加人文类选修课程,使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科学精神教育有机结合。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所谓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并通过环境熏陶、社会实践等活动,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正确解决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被内化为受教育者的人格、气质和修养等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从而成为维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人文素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21世纪,人才应具备的素质中人文素质是最根本、最基础的。人文素质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本有之义,是一切教育的共同本质和基础,丢掉了这个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失去了教育的骨血,就不是成功的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任务,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的推动和支持下,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省高等职业教育异军突起,特别是近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省已有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78所,另有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所属高职分院40所,在校生共有72万余人,已成为江苏高教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顺应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对我省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我省一个新型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近30年来已培养输送了数以百万计地方急需的各种应用性人才,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为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前,我国的高职院校还都是专科层次,高职院校的学生在缺少学历优势的情况下,要想立足社会,不仅要有良好的职业技能,还要有良好的人文素质作为支撑。一个人掌握的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以及今后能否继续发展提高,也往往受其人文素质的高低所制约。如果人文底蕴不足,就会缺少发展后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随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所以有人说,人文素养教育是大学生社会化的动力源和推进器,是很有道理的。

长期以来,我省大多数高等职业院校在学制短、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任务重的情况下,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积极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普遍通过开设必修课、选修课,将文化素质教育贯穿、渗透

于专业教育的始终，并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及开展多种形式的参观、实践等活动途径，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据调查了解，我省高职高专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文化素质教育的公共选修课程，少的有几十门，多的近百门。每学期均有几十门课程供学生选修。不少学校把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列入学生的公共必修课，规定了必须获得的学分。但是，学校和学生普遍反映目前开设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没有适合的教材，有些采用教师自编的讲义，难以保证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针对上述情况，我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高职院校的特点和需求情况，组织有关专家和具备丰富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编写了这套提供我省高职院校使用的人文素质教育系列教材，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教材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主要载体，高水平的文化素质教育，必须有高质量的教材作保证。本系列教材的编写，注意吸收高职高专院校教学改革的成果，力图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适应以学生为主体的讨论式教学、辩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个性培养。本系列教材既可以提供给学校教学使用，也可供学生自学。

我们希望这批人文素质教育系列教材的出版能够为我省高职院校开展人文素质教育作出有益的贡献，并通过试用、修改，反复锤炼，能够更具特色，更受广大师生的欢迎，成为我省甚至全国的精品教材。

我们也希望这一批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系列教材的编写、出版，能够锻炼培养一批热心人文素质教育的教师群体，成为推动我省高职院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骨干力量，促使我省高职院校认真探索人文素质教育的规律，针对院校自身的特点，深入研究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课时比例、教育形式、保障条件等，把人文素质教育开展得更有声有色、更有成效。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2009年6月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先秦两汉文学	(1)
蒹 葆	《诗经·秦风》(11)
山 鬼	《楚辞·九歌》(13)
《论语》选读	(15)
逍 遥 游	《庄子》(18)
伯 夷 列 传(节选)	司 马 迁(23)
迢 迢 牵 牛 星	《古诗十九首》(26)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	(28)
白 马 篇	曹 植(36)
咏 怀 诗	阮 翡(39)
西 洲 曲	(41)
别 赋	江 淌(44)
归 去 来 兮 辞(并序)	陶 渊 明(50)
王 子 猛 居 山 阴	《世说新语》(54)
第三章 隋唐五代文学	(58)
终 南 别 业	王 维(67)
长 干 行	李 白(69)
自 京 赴 奉 先 县 咏 怀 五 百 字	杜 甫(72)
长 恨 歌	白 居 易(76)
无 题	李 商 隐(80)
进 学 解	韩 愈(82)
李 娃 传	白 行 简(87)
女 冠 子	韦 庄(94)
清 平 乐	李 煜(96)
第四章 宋代文学	(98)
和 子 由 涅 池 怀 旧	苏 轼(110)
寄 黄 几 复	黄 庭 坚(113)
书 憶	陆 游(115)
八 声 甘 州	柳 永(118)
定 风 波	苏 轼(121)
摸 鱼 儿	辛 弃 疾(123)

暗 香	姜 美(126)
风入松	吴文英(129)
丰乐亭记	欧阳修(132)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135)
第五章 元明清文学	(139)
[中吕]卖花声·怀古	张可久(156)
[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睢景臣(158)
牡丹亭·惊梦	汤显祖(161)
金缕曲·赠梁汾	纳兰性德(165)
己亥杂诗(一三〇)	龚自珍(167)
西湖七月半	张岱(169)
黛玉葬花	曹雪芹(171)
第六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	(181)
围城(节选)	钱钟书(184)
边城(节选)	沈从文(197)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戴望舒(203)
这也是一切	舒婷(206)
骂人的艺术	梁实秋(208)
苦瓜是瓜吗?	汪曾祺(211)
获虎之夜	田汉(213)
第七章 外国文学	(232)
当你老了	叶芝(239)
希腊古瓮颂	济慈(242)
哈姆莱特(经典台词节选)	莎士比亚(246)
卖花女(节选)	萧伯纳(251)
警察与赞美诗	欧·亨利(262)
苦 恼	契诃夫(268)



第一章

先秦两汉文学



概 述

一、远古时期及夏、商文学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像中国文学这样悠久而绵延，三千年的文学传统恰如江河之水一样不曾断绝。从远古先民的讴吟到书面文学的成形，神话与历史的交织，巫风的盛行，劳作的艰辛，仿佛一段迷离的烟雾，深谷幽兰淡漠的芳馨，杳然冥然，不可追寻。

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乃至尧、舜时代，其本身皆未必可信，我们只能从后人的歌声里辨识这梦幻中的年代，如相传为帝尧时期的《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无疑是后人对于古代社会的一种构想。也有一些简朴的韵语歌谣，反映了原始的劳作方式，虽出于后人的追记，但也许是原始歌谣的遗留，如《吴越春秋》中所记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先秦文学中尚无鲜明的主体意识，其文学与文化发展相适应，大致上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各自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夏商以“巫史文化”为其特色，与原始宗教密不可分。“巫”或“史”既是一切文化的代表，也是文学的基本作者，其创作多以祭祀、娱神为目的。

《楚辞》中所提到的《九辩》《九歌》，自夏代已经开始流传，而与祭祀活动相关。具体的诗篇虽然不可见，但据此可以推断：中国文学的出现，远远早于现有的文字记载。《吕氏春秋·音初篇》中所载的《候人歌》及《破斧歌》，也与夏代歌谣有关，如《候人歌》：

候人兮猗！

其歌辞虽然只有一句，但它是远古诗歌的遗文，也许可以远溯至夏代。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尚没有直接来自夏代的文献实物。

伴随着文字的产生，文化与文学开始有了它们最重要的载体。远古文学的总体特色表现为诗、乐、舞不分，文、史、哲一体，作品也不是一时一人所作。

商代社会继承了夏代“巫”的特色，但与对夏代多出于推测不同，目前已经可以从甲骨文及殷商青铜器中看到成熟的文字了。就文学而论，《诗经》中的《商颂》五篇，自商代流传至西周，虽然可能经过后代乐师的改写，不一定是商代诗歌的原貌，但仍与商代诗歌有密切关系，其内容包括商人的始祖神话、商代先君的历史与传说等等。如《商颂·玄鸟》中记载：“天命玄鸟，降于殷人。”

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即燕子，它是商民族的始祖，因而成为商民族的图腾。

《周易》中的部分爻辞，涉及商代的史事，应该是商代文学的遗留。其中有的作品可以视作《诗经》的先导，如《中孚·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又如《明夷·初九》：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散文方面，如《尚书·盘庚》，文字古奥，诘屈聱牙，是流传至今的可信的商代散文作品。其中的许多句子，仍然活在今天的语言中，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夏代以前的文学不可征信，商代可以视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也并不多，大体上可以将其视作中国文学的发源时期。

二、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

西周至春秋时期，“礼乐文化”发展成熟，“巫”的色彩逐渐消逝，史、巫分离，“史官文化”开始繁荣，而“人”的价值也开始得到肯定，因而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和人生。

西周时期的散文，主要保存在上古史书《尚书》中，主要篇目有《召诰》《洪范》《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等，其主要的文体形式有“诰”和“誓”。其中以周公的言论最多，如《洛诰》《无逸》中对成王的告诫，《大诰》中对诸侯的训令，《多士》《多方》中对殷民的训诫等等。这些内容都反映了周初的政治思想。另外，《金縢》《顾命》是记事的篇章，对先秦的叙事散文也有影响。

《春秋》由孔子据鲁国史书编订而成，记事简略，其褒贬的体例对后世的史书有很大影响，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散文。

《左传》则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成就最高的一部著作。此书大概编成于战国早期，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尊礼重德，以礼的规范进行历史判断，并给后世提供借鉴。它以《春秋》为纲，通过生动流畅的历史叙述，为中国叙事散文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典范的作品。

《左传》以第三人称叙事，并以旁观者的身份，用“君子曰”的形式发表评论。叙事有倒叙、预叙、补叙、插叙等多种方法，其中以描写战争的场景最为突出。《左传》中所描写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有几百次，其中对重要的战争如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的描述最为精彩，历来为人所称道。其战争描写注重战争的前因后果，使读者不仅对战争的场景有形象的认识，而且能对历史发展的脉络把握得极为分明。

《左传》对人物的描写也极有特色，如对郑庄公、晋文公、郑子产、齐晏婴等人物的描写，都能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以及复杂性。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一般没有心理描写。

《左传》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行人的辞令之上。如僖公十三年烛之武退秦师，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等，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委婉谦恭，有的词锋犀利，但都用词典雅，文采斐然。同时，其叙述的语言有时文约义丰，极具表现力，如写邲之战中晋师溃败，“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国语》与《左传》大体同时，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以记言为主，包括朝聘、宴会、讽谏、应对等多个场合。各国史事记载的风格并不统一，或委婉，或流畅，或隽永，其总体水平不及《左传》，但也颇有特色，如久为传诵的叔向贺贫、邵公谏厉王弭谤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国语》中也有少量记事的篇章，如晋公子重耳之事，描写生动细致。

《战国策》则代表了史传散文中奇谲恣肆的特色。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当此之时，礼崩乐坏，周室衰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足以说明这一变化之剧烈。《战国策》表现的是当时纵横家的人生、政治思想，反映了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与之前历史散文中表现的儒家思想是不同的。它记录战国时期的重要史事，叙事和语言都表现出一些新特色。

在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上，《战国策》中的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高隐之士如鲁仲连，勇武之士如聂政、荆轲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战国策》有比较多的虚构成分，同时也注重集中地表现单个人物，使其形象更加丰满，表现出由《左传》的编年体形式向纪传体转变的特征。

《战国策》的语言艺术是其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它已经从《左传》《国语》中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转变为纵横捭阖的说客之辞，铺张扬厉，气势逼人。这些说辞更多地运用比喻、寓言、佚事等方法，如《楚策》中庄辛说楚襄王，通过四个比喻，层层递进，让闻者信服。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也都来自《战国策》中的寓言。同时，《战国策》也通过排比、夸张、递进等各种修辞方法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这一风格影响深远，在后代作家如贾谊、苏洵、苏轼等人的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留下的痕迹。

战国时期，王官之学为私学所取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各有不同的文化及文学特色。“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郭沫若语），各有千秋。与历史散文并峙的诸子散文出现了。

诸子散文的发展，在文体上经历了三个基本的阶段。第一阶段以《论语》及《老子》为代表，第二阶段以《孟子》《庄子》为代表，第三阶段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文体由简而繁、逻辑由疏而密可以看作诸子散文的文体发展特征。

《论语》是语录体，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而成。《论语》语言平实深刻，含蓄隽永，有很多内容可以看作修身的格言。《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犹如简练的哲理诗。两书文约义丰，奠定了诸子散文的基础。

《孟子》长于论辩和譬喻，但逻辑上并不严密。孟子有时用一些寓言故事来表达道理，深入精到。书中注重文章的气势，以浩然的精神修养发为文章的磅礴气势，在文体上则使用大量的排偶句、叠句以增强说服力。语言平实浅近，精炼准确，是一种成熟的语言风格，对后世的散文作家韩愈、苏洵等人有较大的影响。

《庄子》以寓言为其最主要的表情方式，如蜗角蛮触、庄生梦蝶、骷髅论道，都以奇诡的思想

象展现其哲学思想。有时寓言中也有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儒以诗礼发冢”对儒家的揶揄,支离疏的“以丑为美”的形象等等。这些对于后世的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庄子的散文具有鲜明的诗意特征,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辨合为一体。《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舒卷自如。苏轼的散文风格就深受《庄子》影响。《孟子》《庄子》两者的文辞比春秋时期更加繁富,而说理也更加畅达,对后世散文的影响也最大。

《荀子》思理严密,论证全面,篇章首尾一贯,各篇之间也有照应,表现出系统而又严谨的特征。书中大量运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譬喻,深入浅出,使理论形象化。《韩非子》也长于运用寓言,但与《庄子》相较,则题材较为平实,多以现实中可见的形象作为寓言的素材,于平实之中见奇妙。《韩非子》以论辩的透彻、逻辑的严密而成为诸子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荀子》与《韩非子》的共同风格是逻辑严谨,分析深入,文辞富赡,代表着先秦诸子散文的最高文体成就。

三、《诗经》与《楚辞》

《诗经》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文学成就,衣被百代,辉映千古,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核心特质——抒情传统。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诗经》中所收集的大部分是从西周到春秋约五百年间的作品,其产生的地域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北部。其编集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但具体过程不可考,其中包括了通过各种方式从各地搜集来的作品,也有公卿列士的献诗,最后经过周王朝乐官的整理而成书。全书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地方的曲调,《诗经》中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160篇;“雅”是朝廷的正乐,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颂”是宗庙祭祀的音乐,有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诗经》的题材广泛,有祭祀诗、史诗、农事诗、宴会诗、怨刺诗、爱情婚姻诗、田猎诗等各种类型。祭祀是上古社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以对祖先的祭祀和歌颂为主。《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主要叙述了西周的开国史,可以视作史诗。农事诗是《诗经》中的重要类型之一,周代以农业立国,《周颂》中有许多祭歌反映了周代与农业相关的习俗,如祈谷、藉田典礼、丰收后的报祭礼等,《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诗都是这种礼俗的反映。《豳风·七月》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首农事诗,全诗以时令为序,叙述了农夫一年的生产和生活。宴会诗也是《诗经》中的重要内容,其主题是君臣、朋友、宗族的宴饮。宴会是周代的礼仪之一,以宗法来维持社会政治的和谐发展,所以它也是一项实际的政治活动,《小雅·鹿鸣》等可为其代表。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这是在国家政治衰败时出现的反映时政的诗,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以及国风中的《硕鼠》《新台》《株林》等,或正言告诫,或强烈谴责,或委婉讽刺,都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反映。爱情婚姻诗则是《国风》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们或反映男女的爱恋,或反映相思的痛苦,或反映婚礼的盛大,或反映婚姻的不幸,或反映怨妇的悲叹,内容十分丰富。总之,《诗经》中反映现实的方方面面,对于后世诗歌的题材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艺术上,《诗经》的创作手法分为“赋”“比”“兴”三种。赋是铺叙,将诗人的情感及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是比喻,用一种事物比作另一种事物;兴是感发,某种事物或者情境

触动了诗人，引起诗人的歌唱。《诗经》以四言句为主，间有杂言，多用虚字和重言及双声叠韵，章法上则有大量的重章结构的运用，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味。

《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具有典范的意义。其“风雅”的内容，“比兴”的手法，乃至诗歌的语言和结构等都是后世诗人取法的对象，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的光辉起点。

“楚辞”以其原始瑰丽的诗风和浪漫奇特的想象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另一源头，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语）。大体而言，《诗经》产生于中原文化之下，是礼乐文明的象征，而楚辞则产生于南方的楚地，虽然在屈原的手中得以成熟，但楚地文化“信巫鬼，重淫祀”，楚辞中所体现出的原始性以及“巫系文学”的特色，足以与中原的礼乐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形式上，楚辞与《诗经》有很大的不同。《诗经》以四言为主；楚辞则多以六言句加上“兮”字构成，“兮”字所处的位置不同，构成不同的句式，参差不一，灵活多变。

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离骚》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以忠君爱国为其主题。诗的前半部分以现实的手法表现了自己的品质，描述了自己和“党人”之间的政治矛盾，并表达自己九死不悔的信念。诗的后半部用一种极其浪漫的笔调，发扬了楚地文学“游”的传统，以一种上下求索的游历来表达自己彷徨抉择的心路历程，突出表现了诗人对于祖国的眷恋和热爱。《九歌》共11首，是一组祭歌，以“人神恋爱”的笔调，描写了对神灵的依恋和崇敬。这是巫风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如《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等作品，人物缠绵动人，语言清新优美，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性。《九章》是一组诗歌的总称，非作于一时，成就及风格也不相同，如《橘颂》是最早的咏物诗，《涉江》表达了自己品格的高洁，《哀郢》是对楚国覆亡的感叹，都达到了较高的成就。《天问》是一首通篇以问题形式出现的诗，以四言的形式为主，列举了对天道、人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归结为对楚国政治的关心。《招魂》也是受到巫风影响、化腐朽为神奇的名作，诗歌是屈原为招楚怀王之魂而作，表达了屈原的宗国情结，诗歌语言华丽，想象丰富，以铺陈为主，对汉赋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屈原创造了“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香草”通常用来象征高洁人格，与“恶草”相对，同时构成政治斗争中的双方。“美人”或用来比喻君王，或用来自喻。在诗中，屈原多以弃妇的形象出现，与中国传统以夫妇与君臣相比拟的思维也相符合。这一比兴方法的运用，发展并丰富了《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

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宋玉是在屈原直接影响下较有成就的楚辞作家，其最重要的作品是《九辩》，作品将志士失职的不平与秋天的凄凉结合在一起，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悲秋”的主题。屈原的节操在后代的士大夫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也使历代仁人志士得到鼓舞和感召。在艺术上，楚辞这种文学样式在历代皆有创作，其宏伟奇特的想象力对李白、李贺等诗人都有很大的影响，而“香草美人”也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固定形象。

四、秦汉文学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自秦开始，中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自西周以来实行

的封建制度,经过春秋战国以来的不断破坏,终于在秦代被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郡县制所代替。

秦朝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加之其立国年代很短,所以秦代几乎没有文学创作。汉代制度基本上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作了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及文学发展的措施,文学的发展逐步繁荣,并在诸多方面都为后世文学树立了典范。

汉初楚辞颇为盛行,一方面是由于汉初的帝王和功臣都是楚人,另一方面是由于士大夫们对屈原遭遇的认同,并出现了以贾谊为代表的楚辞作家,为汉赋的发展铺垫了道路。同时,汉代学术中烦琐的解经风气也影响到文学创作中,对汉赋的铺张扬厉之风起了推动作用。

汉代的诸侯王多对学术或文学有极大的热情,他们招致门客,较著名的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门客如枚乘、邹阳、严忌、司马相如、羊胜、公孙诡、韩安国等,都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或学者。西汉武、宣、元、成等帝王也对文学有兴趣,大量文人因而成为文学侍从,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等。东汉外戚把持政权之际,也招揽杜笃、傅毅、马融、班固等著名文人为门客。诸侯、天子、外戚的招纳,对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同时,汉代设立了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等与文学相关的机构,对汉代的乐府以及诗赋的发展同样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汉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包括赋的创作、乐府诗与五言诗的繁荣、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发展等三个方面。

辞赋尤其汉大赋是汉代文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汉初骚体赋盛行,贾谊是最重要的作家。他的《吊屈原赋》是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途经湘水时所作,赋中表达了对屈原的同情和尊敬,也是对自己身世的叹息,情感激切,为汉初的代表性赋作。其《鹏鸟赋》则以对话的方式,用道家的理念表达了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

最先开拓汉大赋的作家是枚乘,他的《七发》通过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的描写,尽铺陈之能事,意图却在于最后一段论“天下之要言妙道”,对膏粱子弟进行劝诫。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代大赋体制的正式确立。

汉大赋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其《子虚赋》《上林赋》是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赋中虚构了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对话,通过对楚国云梦和天子上林苑及畋猎场景的描绘,最后归结为对奢侈的批评,展现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作品中对于苑囿及畋猎的宏大场面的描写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在艺术上,这两篇赋作韵散结合,波澜起伏,句法灵活,长短间用,多用排比,在多方面超越了前人。

汉赋在西汉时期的重要作家还有王褒和扬雄。王褒的大赋以《洞箫赋》为代表,先从竹的生长环境写起,山川的孕育、天地的滋养、猿鹤的悲吟,构成了洞箫先天的因素,然后再强调乐师的高超技艺。其创作模式对后来以音乐为题材的赋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扬雄作为西汉末期的重要赋家,大赋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赋最为著名,其赋作之铺张夸饰、驰骋想象,表现出了汉大赋的基本特征,较前人之赋更有一种华丽的风格,但其讽谏的力度却因为其铺张的华丽而更加削弱。扬雄还有《反离骚》《逐贫赋》等楚辞体作品,其《蜀都赋》则是后世京都赋的先声。

西汉末的刘向、刘歆父子也以辞赋见称，刘歆的《遂初赋》更成为东汉纪行赋的先导。东汉时期的赋作，在大赋方面以京都赋为主，抒情赋则以纪行赋和述志赋为主体。

京都赋与东汉迁都的政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迁都洛阳还是定都长安，是当时的重要政治事件。较早出现的杜笃的《论都赋》主张返都长安，而影响最大的却是班固的《两都赋》。《两都赋》由《西都赋》和《东都赋》两个有机的整体构成，其风格及写作手法成为京都赋的范例。

《西都赋》以繁丽的笔调表现了长安的形胜和品物的丰富，汪洋恣肆，风格上继承了西汉大赋的特色。《东都赋》则更多地表现了作者的京都意识，西都虽然繁华，但洛阳的法度之美，则非物质的富厚所能比拟，故其风格以平正典实见长，表现出重声教、崇文德、尚礼制的法度。西汉大赋在格局上往往“劝百而讽一”，对事物的铺叙远过于劝谏的点染，而《两都赋》中则以《东都赋》全篇的讽谕改变了这一模式，是大赋体式的新发展。

张衡的《二京赋》（《西京赋》《东京赋》）同样是以京都为题材的大赋名篇，其在形式及命意上皆模拟《两都赋》。《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对长安的繁盛富丽进行称颂，《东京赋》则是安处先生对西京奢侈生活的否定而重点展现东汉君主对礼教和道德的崇尚。

东汉的抒情赋主要继承了屈原骚体赋的创作艺术，多表现作家不遇的感伤与愤懑，这一传统自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扬雄《逐贫赋》以来，不绝如缕。东汉的抒情赋分为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纪行赋通过记叙旅途所见来抒发自己的感慨。西汉刘歆始有此类作品，东汉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以及蔡邕的《述行赋》。

述志赋则是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感，东汉时期主要的代表作有冯衍的《显志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和《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归田赋》篇幅短小，语言清新自然，反映了道家思想的影响，是我国文学中最早描写田园归隐之趣的作品，也是汉代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赋，在抒情小赋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刺世疾邪赋》感情直率，对当时的社会形态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篇幅也很短，语言朴素，是汉代抒情小赋中的代表作。

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它有很强的时代性，“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充分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苦与乐、爱与恨、生与死。《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作品表现的是平民百姓的疾苦，如《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盈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无衣无食的贫穷，使诗中的主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铤而走险。这些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的痛苦时，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有的诗则反映了富贵之家的情景，如《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等。

爱情诗在汉乐府中有不少表现，许多诗的风格直白坦露，如《上邪》所表达的是一个女子热烈的誓言：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有所思》表现的则是女主人公对男方由爱及恨的表白，爱的热烈与恨的痛苦，都直白无所隐。《孔雀东南飞》通过表现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婚姻悲剧，批判了礼教对人情的束缚，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诗歌以浪漫的形式结束。全诗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结构谨严，标志着汉乐府中的叙事诗达到了高峰。《陌上桑》《羽林郎》则通过罗敷和胡姬的形象，嘲弄了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薤露》和《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表达了诗人对于生死的思索。如《薤露》中说：“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战城南》则表现了对阵亡将士的哀悼。与此相关联，汉乐府中乐生恶死和求仙的渴望也表现在诗中，如《日出入》《练时日》《长歌行》《董逃行》等。

两汉乐府诗中虽然有很多抒情诗，但叙事诗更为突出。诗人善于选择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情景入诗，如《陇西行》《羽林郎》等；也表现一些偶然性事件，如《上山采蘼芜》写弃妇与故夫相遇的故事。在情节的表达上，多能比较完整，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等都有比较连贯而曲折的情节描写。《孔雀东南飞》更是以两条线索展开描写，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极其鲜明。这些都表明汉代的乐府诗是我国叙事诗发展的高峰，并对后世叙事诗有积极的影响。

东汉时期的文人诗歌出现了新的局面。较早的文人诗中有班固、张衡、秦嘉等人的作品。班固的《咏史》是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写缇萦救父的故事，风格质朴。张衡继班固之后，在五、七言诗的创作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代表作品是五言的《同声歌》以及七言的《四愁诗》。《同声歌》借鉴民歌的表现手法，全篇以一个新婚女子的口吻来叙述，诗歌有一定的寄托意义。《四愁诗》是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七言诗，表现了自己的政治寄托，通篇除了每章首句中有一个“兮”字，其余都是标准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张衡五、七言诗的艺术水准已经比班固有了很大的提高。秦嘉的《赠妇诗》三首艺术性较高，代表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它们不作于一时一地，亦非一人所作，主要内容是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以及思妇的闺愁，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汉代士子为了谋生而客居异地，多表现出一种思念故乡的情结，而其思念的对象则多是其妻子，因而乡情、恋情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如《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远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诗中所表现的思妇也各有形态，她们或对别离时间的长久感到伤怀，或盼望游子早日归来，如《庭中有奇树》：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

《古诗十九首》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是多方面的，或表达对家乡及亲人的思念，或表达对世态炎凉的怨愤，而人生无常的感慨则是其中体现得最多的一个主题。社会的动荡造成生命的脆弱，有的希望通过求仙而延长生命，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及时行乐的思想，佳人美